

← (上接 11 版)

的事情。我是 1996 年夏天入所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他已结束返聘，其实是个编外人员，还每个返所日必到，车费都是自贴。他不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张捷夫担任主编的《清代政治史研究》课题，还欣然做我的业务指导，并动员姚念慈师一起承担了其中“开国篇”的工作，到 1998 年底前完成了这项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工作，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成果，本来很有意义的纪念，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可惜了。

完成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工作后，我生了一个女儿。尚未返所上班，何先生就督促我开始写四库禁毁书中有关钱谦益的文章了。完成之后，他再次建议我继续研究王钟翰先生原来给我定的关于洪承畴的论文题目（当时做不出来跑偏去了），还盯着我先拟出题目名称，听完后会说这个题目比那个题目要好。定好题目后，再拟目录，他会帮我分析这个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我在开始读方志后，他会说方志是用来查的，不要一页一页去读。先看目录，然后就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到哪里查。至于我写了初稿，他更是一字一句地审读，从寓意挖掘到遣词行文，一点一滴地教，我亦步亦趋地改，完全是传统作坊里师父传承手艺给徒弟的方式。我之所以更愿意跟别人称他为师父而不叫他老师，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作坊式的指导，现如今在哪个大学里能找得到呢？时代变迁真令人有天差地别之叹。

何先生对待工作的庄重和认真，编辑研究室创办的《清史资料》《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融化在这些成果里。他自己也说：“对于室里的的工作，我真是全力以赴，不惜时间，不吝精力。”他才情焕发，尤其是碰到学术“兴奋点”时，简直可以说是喷薄而出。比如他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其揭示的清初存在暗潮汹涌的地下反清运动，深感震撼。认为“复明运动”意义重大，特别适合表现史学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功能，继续沿着陈先生开辟的道路，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广、北方多地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构成了一部反清复明运动和明清之际的政治史，成果集结问世于 2016

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清初复明运动》，只是未收入《〈柳如是别传〉（读后）》（哪怕是作附录呢？），或许对略窥全豹稍有影响。他跟我说过，在写这篇文章时，顺手得每天能写三四千字，写完也来不及誊抄，就跟所代表团去日本了，剩余的事情还是师母收的尾。

何先生还说过：“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追求一点理论概况。我有这个习惯，但思维比较浅。我最满意的文章就是隔壁戏这篇文章，理论概况做得比较像样，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看来他最看重的还是对独创性的孜孜以求。他喜欢做《隔壁戏》这样的戏曲艺术史研究，就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做”。艺术史的人不（这样）做，文学史的人也不做。这大概就是 he 得意这篇文章的原因吧。他应该不止一次或对一人表达过这种想法或看法。这样的思维和成果，非兼具秉赋和才情不能产生。在他病重阶段，仍在孜孜从事的是对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即吴伟业所说的“楚两生”）的研究，业已成型，交付出版，只可惜来不及看到成书，这也是一项令他“高兴得真是莫可名状”的工作。期间，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坚持认为“自秘材料，不是好风气”。他还意犹未尽地跟我谈过清代艺术、文化史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些点，比如虎丘歌会就是一例。他说这是一个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之前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很值得深入研究，还有新闻纸之类的好题目都值得精耕细作。他也会对电视播出的所内同事讲座，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家谱讲座对家谱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有关收族的作用评价少了点之类的。

他重视清史学术史研究，研究清末民初一批清史、断代史著作，还有孟森、陈垣、谢国桢、商鸿逵等前辈先生的清史研究成就及重要明清史著作，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独特的归纳和总结，对帮助年轻人提高学术鉴别力，功莫大焉。这在《五库斋清史丛稿》《孟心史学记》等论著中都有集中体现。

### 三

从江西迁居湖南湘乡城务门前的何氏，是个传统的大家庭。家乡厚重的历史沉淀及家庭出身、社会变故，加深了先生对社会生活的体认。但凡跟何先生接触或读他文章时，都能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在北京大学所受的良好历史教育，与他独特的个性和际遇相结合，造就了一个为人正直，说话幽默，个性鲜明的纯粹学者。先生论人论事，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看法，一直让我受益匪浅，大开眼界。

2011 年 4 月，先生摔坏了大腿骨，住院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在病房里，他跟我谈了好多话题。其中有个话题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姚念慈师给他写的一封信，即对《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提的具体意见。当时，何先生有些激动，说：“姚念慈的思维深度、广度都比我好”，但也有“不太理智”的地方，比如“把我们的政治史研究与 xx（姑隐其名）相提并论”，还有“无理”的“定是非”的说法，这不是他的风格。先生说学术是个渐渐进步的事情，如果老早有定论了，还要什么研究？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从无是非可定，一万年也会出现新思维，没有最终思维、最终结论，也无所谓是非问题，只可能提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来，或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结论。人文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相对正确的，也许有可能会有一个正确，但不能说是将来思维的最终结论。就像有人说《清代全史》能管十年，二十年，有一定的道理，比“定是非”的说法要好。现代人的著作许多如孟森，结论相对正确，维持比较久，但不能说是最后的定论。“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认为那就是最后的思维”。可见，那封信对他颇有触动。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心平气和了。

次年八月的一天，何先生又跟我谈起姚念慈的那封信，谈到他的几点看法，说姚念慈可算得上是“21 世纪的头号史学家”。这让我吃了一惊。怎么说得这么直白、尖端呢？史学界有那么多的分支领域，这种“华山论剑”式的说话风格，如果在公开场合，会不会引起“头破血流”式的争斗？但转

念一想，总强调大将出场要打急急风的何先生，既然是跟我聊天，谈论的对象也是彼此熟悉的人，没有包袱，没有负担，谈他自己的感觉和看法，又有什么不妥呢？何况原来他对姚念慈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更说明他已经过认真审视和反复思考，不是哗众取宠或故意一鸣惊人。何先生说对于那篇文章，一般人的反应都是“思想的懒汉”，只有姚念慈的反应“最深刻，最准确”，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思维力度和深度。在自己收到的上千封书信中，姚信可谓是“最深刻的一封”。姚念慈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维习惯，只是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把他一般化了”。还要求我也要“把思维往老姚那个方向转一转”。可见何先生基本上接受了姚念慈的观点。我辩解说每个人的禀性、能力各不相同，怎么能对我做同样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自甘堕落，流于做一个“思想的懒汉”而不愿自振。行文至此，心有惴惴，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带来意外的伤害。

在病房里何先生还谈过另一个看法，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对李世愉先生的评价很高，说“历史所的人对他估计不够”，可以说他“非同一般，有很大的特点。你看他，办起事来大气磅礴，不计较小是小非，比较放手”。在他调到清史室前，我并不认识李先生。只是在原来的《词典》组办公室买到过一套处理的上海古籍缩印版《二十五史》，因为所里撤销了《词典》组。何先生觉得历史所“近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四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中国科举制度大词典》《中国地名大词典》。这些虽然不都是李世愉做的，但他参与了大部分工作，是组织者、撰稿者和审核者，也是整个词典运行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看法，在所里从来就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而何先生那时刚从手术室里出来不久，却目光如炬，振聋发聩，所言所语都是我闻所未闻。不管正不正确，至少他的看法，跟别人、跟主流不一样，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且带有鲜明的“何氏”特征。这种特征在我尚未入所、聆听他在王钟翰先生诞辰 8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时就已领略过了。当时他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他的用词定位让

我印象深刻，就是“何氏”特征的典型体现。

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个活在“思想”里的人。尽管到晚年，他的思维经常会出现时空错乱，但无论是喃喃自语的嘀咕，还是确凿有据的书写，都说明他的脑子里热闹非凡，他就是思维世界里总不停息脚步的一个长跑者。在他的脑回路里，早年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日本军队入侵湘乡。1944 年夏天，当时他 12 岁，大概在念小学四五年级，逃难的生活、日本兵要抓他的姨夫、抢他妹妹养的鸡，还在逃走人家里做好的米饭里拉屎，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刺激他不断重返现场。甚至在离世前一周去看他时，他在念叨的往事还是“日本人很坏”，“会扮成中国游击队的样子，要抓我的姨夫”等等。这些刺激，是他一生的噩梦，也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灾难，故乡那遭难的家令他毕生铭心刻骨。2012 年夏天，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他静静地听着，插了一句：“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了。我“喂”、“喂”了好几声，也听不见回应。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窸窣窣的声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泪了。“故乡”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刘齐说故乡管着你的成长你的胃，还有你的眼泪你的心。湘乡那块埋葬着他的父祖、挚爱的养母及其故旧亲朋的土地，正是先生回不去的故乡。他的眼泪经常控制不住，尤其是老病的身躯，载不动这许多乡愁。从此，我不再跟他提湖南。

还有一种刺激则来自内行的磨难。何翔师弟几天前说，他所收到的父亲最新的手迹是一份检讨汇报，这应该是先生中年前后生活中难以磨灭的另一些记忆。不仅使他神经紧张，甚至在潜意识里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那些往事：在春节临近之际，被遣散到河南干校，用杨绛先生的词是“连锅端——拔宅下放”而不是飞升，所以自己踩三轮车把精心积攒的学术书籍和资料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只留一小纸箱的书和卡片，精装书的封皮还得撕掉才肯收购，二毛八分一公斤。说起这些往事时，他口吻平静。但我知道它们带来的刺激，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

(下转 13 版) →